

第二章 唐代小說中女性角色出現的察看

唐代小說和唐前小說相比，有一特殊現象，即故事中所描述的女性角色遍及社會各階層，且以女性為主要角色的故事篇章增多。文學創作深受當代文風及社會因素影響，具有時代性，故能反映部分社會現狀。本章即以唐朝的社會背景為基礎，依據婦女地位的轉變、唐人講故事風氣盛行、藩鎮的影響三方面分析女性角色大量出現的原因。

第一節 婦女地位的轉變

唐代婦女因為當代特殊的人文、社會背景，使其地位有所轉變。本節以胡風的盛行、帝王重視文教及婦女視野擴大三個面向，分析探討轉變的成因。

一、胡風的盛行

唐代建立者李氏家族為鮮卑化的漢人，如高祖之母獨孤氏、太宗之母紇陵氏、皇后長孫氏，都是鮮卑人，而他們又長期居住於北方，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使之具有一視華夷的開放心態。¹在政治軍事方面，貞觀四年，唐平定突厥，太宗從溫彥博議，遷突厥於河南朔方，突厥人入居長安者近萬家，²胡人大量遷居中國。在經濟上，唐代推行均田制，使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能有土地耕種，限制地主豪族佔有過多土地。實行租庸調法，使百姓的賦稅和徭役負擔有所減輕。採用與民休息的經濟政策，使唐初迅速出現了經濟空前繁榮的局面。太宗貞觀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³國內經濟富庶，自然對外經濟和文化交流事業也隨之發達，胡商在長安、洛陽和揚州

¹ 參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頁5-7。以及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2刷），頁89-91。

² 參見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4刷），頁1311-1314。

³ 《新唐書》，〈志第四十一·食貨一〉，頁1344。

等大城形跡到處可見，像今日的海外華人多聚居於中國城一般，胡裔也有特定的居住圈，以長安為例，胡裔多居於西市，這現象唐代小說多有反映，如：段成式〈寺塔記上〉：「前攜至西市，示於商胡。」⁴李復言《續玄怪錄·杜子春》：「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⁵李肇《唐國史補》：「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⁶劉肅《大唐新語》亦記載：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俄果獲賊。⁷

上述小說引文在在標明當時胡裔均有固定的居住地，即西市。大量西域人東來，其中應有不少婦女在內，可惜並未發現文獻，足供佐證。但唐人詩中多詠及胡姬，如張祜〈白鼻騮〉：

為底胡姬酒，常來白鼻騮。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

唐代著名大詩人李白好飲酒，其作品中有多首提及胡姬，如〈白鼻騮〉云：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前有一尊酒行〉云：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鑪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安歸。

〈少年行〉之二云：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

⁴《全唐小說》，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五，頁 1175。

⁵《全唐小說》，李復言《續玄怪錄》，頁 796。

⁶《全唐小說》，李肇《唐國史補》，頁 1871。

⁷《全唐小說》，劉肅《大唐新語》卷九〈從善第二十〉，頁 1777。

酒肆中。

〈醉後贈王歷陽〉云：

書禿千兔豪，詩裁兩牛腰。筆蹤起龍虎，舞袖拂雲霄。雙歌二胡
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之一云：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臨當上馬
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
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

楊巨源〈胡姬詞〉云：

妍艷照江頭，春風好客留。當壚知妾慣，送酒為郎羞。香渡傳蕉
扇，妝成上竹樓。數錢憐皓腕，非是不能留。

賀朝〈贈酒店胡姬〉：云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紅氍鋪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盤初繪
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歌樂世娘。

岑參〈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云

胡姬酒壚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灞頭落花沒馬蹄，昨夜微雨
花成泥。黃鸝翅溼飛轉低，關東尺書醉懶題。須臾望君不可見，
揚鞭飛鞚疾如箭。借問使乎何時來，莫作東飛伯勞西飛燕。

施肩吾〈戲鄭申府〉云：

年少鄭郎那解愁，春來閒臥酒家樓。胡姬若擬邀他宿，挂卻金鞭
繫紫騮。

白居易〈胡旋女〉云：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

從上述引詩可得知，胡姬到大唐所從事的職業多為賣酒及舞者。受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和胡人頻繁的交流下，中國傳統的音樂、舞蹈乃至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和娛樂，都受到西域、中亞的影響，而有了空前的發展。連帝王都愛看胡戲，尤其是唐中宗，依《舊唐書》載：「神龍元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門樓觀潑寒胡戲。」⁸他不但在御樓上自己觀賞，還率領各部門官員離開宮中前往樂舞演出地觀賞，「景龍三年十二月乙酉，令諸司長官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寒戲。」⁹對於胡風的愛好，至開元時更加顯明，引《舊唐書》二段記載：

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¹⁰

開元來，婦人例著線鞋，取輕妙便於事，侍兒乃著履。臧獲賤伍者皆服襪衫。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

11

盛唐時，社會風尚流行衣胡服、飲胡食、賞胡樂、觀胡舞，這股風潮至中唐仍未止息，王建和元稹都是中唐人，在他們的作品中反映出當時的俗尚：「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王建〈涼州行〉）、「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元稹〈法曲〉）經過長久的浸淫，胡樂、胡妝、胡音成為唐人生活與休閒的

⁸ 《舊唐書》，〈本紀第七·中宗〉，頁 141。

⁹ 《舊唐書》，〈本紀第七·中宗〉，頁 149。

¹⁰ 《舊唐書》，〈志第二十五·輿服〉，頁 1957。

¹¹ 《舊唐書》，〈志第二十五·輿服〉，頁 1958。

一部份。在胡舞部分，段安節《樂府雜錄》載：「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球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球子上。」¹²白居易〈胡旋女〉亦云：「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舞名曰旋，這舞蹈具有火爆熱烈的特點，屬健舞曲，是游牧民族豪放性格的生動體現。這種矯健活潑的舞蹈，正和開朗蓬勃的唐代社會精神相適應，合乎時人的欣賞趣味和審美需求，因而一直深受唐人的歡迎，連楊貴妃及安祿山均擅長跳胡旋舞。這股胡化風潮從初唐、盛唐、中唐直至唐末未曾停止過，受這胡化風潮的影響，唐代的審美觀重健美之風，不論男女均崇尚勇武的精神。

二、帝王重視文教

在唐代小說中，我們可以察覺：作者在故事中塑造女性色藝之美的同時，又融進了對女性才情的讚嘆和欽佩。像〈鶯鶯傳〉寫她善彈琴、屬文；〈飛煙傳〉裡，作者用大量篇幅記錄飛煙的詩歌，字裡行間透露出欽佩和讚美。唐小說記載了女性的良好修養和不凡才情，在側面影射出了唐代新興的女性觀。唐代傑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贏得了正直文人騷客的尊重敬慕，才情美是小說中女性精神內涵的特徵之一。

對女子才情的注重主因，首推唐代帝王對教育的重視。太宗曾對長孫無忌誇耀女兒臨川公主，雖學習不多，但書法寫得不錯，比得上王羲之女兒孟姜。¹³武太后（武則天）也多涉文史，好雕龍之術。¹⁴再加上科舉制度的因素，唐代非常重視教育。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提到：「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之童恥不言文墨焉。」¹⁵連五尺之童都重文墨，何況是婦女。德宗時，民間碩儒宋廷芬，有五位女兒，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嫁

¹² 《全唐小說》，段安節《樂府雜錄》〈俳優〉，頁 2096。

¹³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703。

¹⁴ 杜佑：《通典》（台北：新興書局，1965 年），頁 84。

¹⁵ 杜佑：《通典》（台北：新興書局，1965 年），頁 84。

人，「欲以學名家」，宋廷芬因女兒們才高聽其學，不加干涉。後皆被德宗召入宮中，被稱作學士，而宋廷芬的兒子卻愚不可教，終身為民。¹⁶宋氏姊妹受教育並不只是單一現象，在唐代墓誌銘中，載有許多具有才情的婦女，對其擅長的才華，都備加推崇，如惠氏「銀鈎擅寫，蔡女非儔」¹⁷、張女羨「文章卓犖，班女慚其詞賦」¹⁸、張婉「雅好文墨，居閑覽玩篇籍」¹⁹、費婉「非鉛灑墨，觸象而成篆畫；艷錦圖花，寓情而發詞藻」²⁰、鄭叔「以蔡琰之年，聞絃知絕；當謝姬之歲，見雪能詠。慧心紈質，洵美且都。」²¹……由此可知，唐代對女子受教育採肯定、支持的態度。

除了私人家傳之學，唐代的學校設置相當普遍。除國子監外，還有朝廷曾多次下詔興辦的為數眾多的州學、鄉學以及鄉民自辦的村學。唐高宗於總章三年五月曾詔令「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²²這是由朝廷下命令，將各地州縣的學館作一次普遍的調查，並加以修葺。唐代教育的發達，除了中央各學館有較完整的組織外，還表現在教育的普及上。有唐一代，除了州縣學以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鄉學。唐玄宗於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下詔說「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²³這是針對鄉學的詔令。開元時期，即由朝廷下令，在州縣之下，每一鄉都設置學校，並由官府配備師資，教授生徒。德宗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曾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為鄉學」²⁴這些都可見唐朝廷君臣對鄉學的重視。

鄉學一般是朝廷官府興辦的，屬於官學。官學之外，朝廷還獎勵私人

¹⁶ 《新唐書》，〈列傳第二·后妃下·尚宮宋若昭〉，頁 3508-3509。

¹⁷ 《唐代墓誌彙編》，頁 506。

¹⁸ 《唐代墓誌彙編》，頁 13。

¹⁹ 《唐代墓誌彙編》，頁 278。

²⁰ 《唐代墓誌彙編》，頁 951。

²¹ 《唐代墓誌彙編》，頁 1131。

²² 《舊唐書》，〈本紀第五·高宗下〉，頁 94。

²³ 《舊唐書》，〈本紀第九·玄宗下〉，頁 72。

²⁴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4刷），卷三十五〈學校〉，頁 635。

興學，開元二十一年五月朝廷下敕：「許百姓任立私學，欲其寄州縣受業者亦聽。」²⁵私學最基本的單位為村學，這種村學，大抵只有一個教書先生，教著一二十個村童，他的衣食之費則由村中支給。如《玄怪錄》卷三〈齊饒州〉一篇，文中提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²⁶《因話錄》〈竇易直〉篇生動地展現了村學學子讀書生活的一段特寫：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雨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²⁷

這是典型的唐代偏遠村學的生活圖景：校舍破漏，一遇風雨，學生就回不了家，只能擠在一起圍著火堆烤火避寒。描繪質樸而生動，唐代僻野地方的村學，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正因為教育普及，唐人均具有一定水準的學識，婦女自不例外，以詩才為例，反映婦女受教育的成果。唐代婦女大多善於寫詩，能藉詩句抒發胸中感懷。典型例子是《全唐詩》所載若耶溪女子〈題三鄉詩并序〉：

余家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紉蘭佩蕙，每貪悠閒之境，玩花光於風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泊乎初筭，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迴絕塵囂，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游之最。俟其閒寂，因游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弔影東邁。涉滄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挹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衛冤茹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痛哭而去，時會昌壬戌

²⁵ 《唐會要》，卷三十五〈學校〉，頁 635。

²⁶ 《全唐小說》，牛僧孺《玄怪錄》卷三〈齊饒州〉，頁 387。

²⁷ 《全唐小說》，趙璘《因話錄》卷六羽部〈竇易直〉，頁 1979。

歲仲春十九日，二九子，為父後，玉無暇，并無首，荆山石，往往有題。

這篇優美的詩序，把若耶溪女子少女時代的活潑和少婦時代的閒雅寫得極富詩意，恰好與其夫亡故後的哀慟寂寥形成強烈對比。其詩云：「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歸此山。」這一悲劇引起了很多文人的同情，《全唐詩》卷二七六載陸貞洞、劉谷、王祝、王滌、韋冰、李昌鄴、王碩、李縉、張綺、高衢等十人和之。（會昌時有女子題詩三鄉驛，和者十人。）李昌鄴〈和三鄉詩〉云：「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發雲閨。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高衢〈和三鄉詩〉云：「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獨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甚至有的士人不只一次地來到若耶溪女子題詩處憑弔興歎，文宗大和九年登進士第的賈馳就是其中一人，有〈復睹三卿題處留贈〉詩云：「壁古字未滅，聲長響不絕。蕙質本如雲，松心應耐雪。耿耿離幽谷，悠悠望甌越。杞婦哭夫時，城崩無此說。」對那位蕙質蘭心的越女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若耶溪女子若不是善屬文，詩文淒惋動人，那能激起文人士子的共鳴，寫詩相和。

唐代婦女之中有人因詩而有了美好的歸宿，成為詩壇佳話。開元宮人，她在宮中賜給邊軍的纈衣中藏詩一首：「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生緣。」此詩為兵士所得，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幸得詩人皇帝唐玄宗成全，得詩兵士便與宮女二人成為夫婦。²⁸ 唐代男女之間有因詩而成為夫妻的，也有行將離異的夫妻因一首詩而破鏡重圓的。嚴灌夫其妻的故事即其一例。《雲溪友議》載：毗陵慶亭儒家之女慎氏，嫁嚴灌夫為妻。經十餘年無子嗣，嚴灌夫便找些妻子的過失作為休妻的理由。分手之日，他和親友們送妻子上路，慎氏上船時慨然以詩和丈夫訣別，其詩云：「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嚴灌

²⁸ 《全唐小說》，孟榮《本事詩·情感第一》，頁1926。

夫覽詩後，受到感動淒然淚下，改變初衷，接回了幾成路人的妻子。²⁹而薛媛因丈夫南楚材遠游陳穎，不念糟糠之情行將別娶。便對鏡自畫其形，並賦詩四韻寄之：「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南楚材收到圖與詩，心懷慚愧，不再有另謀婚配的想法。薛媛以她「善書畫，妙屬文」的才能，以詩傳情，挽回了婚姻。³⁰

唐代婦女除擅長寫詩外，更廣泛參與書法活動。從舞文弄墨、追求翰墨風韻的閨閣生活，到工巧快捷的平民婦女寫經，乃至於青樓娼妓的紅箋妙書，唐代婦女的各階層都與書法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且其事跡被人們津津樂道、廣為流傳，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與唐代尚才學、重文雅的社會風氣息息相關。就因為這一濃厚的文化氛圍，才造就了唐代眾多的才女。³¹唐太宗之女臨川公主，「工籀隸，能屬文」，³²又如太宗之母，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亦是「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³³唐代入宮之後的宮女，大都要學習各樣的知識技能，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即是書法。《舊唐書·職官三》記載，在掖廷局中，設有掖廷博士，專「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³⁴唐代婦女書法，一般以工巧為主要特點。唐永貞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僅十四，眉緣且長，故名眉娘。眉娘聰慧，結合書法與刺繡，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粒，點畫分明，致使唐順宗歎其工巧。³⁵唐代婦女書法的行列中還有一特殊的組成份子，即娼妓。唐代以前，娼妓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極低的，文化素質也不高。但唐代的娼妓卻不相同，崇文尚藝的時代風尚在她們身上有明顯的折射。唐文人「尚狎」，他們對妓女的選擇除了姿色以外，對於有才學的妓女也特別青睞。色與才並佳並不易得，許多青樓紅妓名揚天下便是因為她們的才藝。

²⁹ 《全唐小說》，范攄《雲溪友議》，頁 2019。

³⁰ 《全唐小說》，范攄《雲溪友議》，頁 2019。

³¹ 王元軍：《唐人書法與文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頁 106。

³² 《新唐書》，〈列傳第八·諸帝公主〉，頁 3646。

³³ 《舊唐書》，〈列傳第一·后妃上〉，頁 2163。

³⁴ 《舊唐書》，〈志第二十四·職官三〉，頁 1871。

³⁵ 《全唐小說》，蘇鶚《蘇氏演義》，頁 2154-2155。蘇鶚《杜陽雜編》，頁 2174-2175。亦載此事。

可以說，妓女知書達禮、能書善畫是影響她們身價的一個極為重要內容。而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與她們的交往又使妓女受到良好的文化修養的薰陶。長安的平康里即是妓女聚居之所。《北里志》記載，長安平康里，妓女所居之地，舉子、新及第進士，萃集於此。³⁶

春風得意的及第進士多來此尋風流才女，其間免不了要作詩酬答，無疑地，善於筆墨兼具豔容的妓女在其中格外受到進士青睞。蜀地有位出名的才女叫薛濤，本是良家女，在父親去世後，便落入樂籍。因其辨慧工詩，風流文人都以與她交接而引以為榮。有名的才子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王建等都與她有過交往或筆墨往來，留下多篇名作。³⁷王建在〈寄蜀中薛濤校書〉一詩中稱她為「女校書、掃眉才子」³⁸明胡應麟亦贊同其說。³⁹元和初年時，薛濤好為小詩，因其喜用的松花箋紙幅較大，便令匠人狹小之，從此廣為流傳，名曰「薛濤箋」。⁴⁰薛濤因惜物又求紙面美觀，便創制出新體制的箋紙。較高的文化藝術素養不僅是妓女生存競爭的需要，也確實是她們發自內心的精神追求。

三、婦女視野擴大

上至朝廷下至庶人均處於崇文尚藝的文化氛圍下，女子透過教育，才識、視野更加增長，她們所關注的，不僅侷限於家庭事務，更把視點擴及於注重社會的安定、關心國家的福祉上。如太宗徐惠妃，四歲就能誦讀論語、毛詩，八歲起喜好屬文，遍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聽聞她的賢名，便納她為才人。徐惠妃時常規諫太宗，「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

³⁶ 《全唐小說》，孫棨《北里志》，頁 2326。

³⁷ 劉禹錫〈和西川李尚書傷孔雀及薛濤之什〉；元稹〈寄舊詩與薛濤因成長句〉、〈寄贈薛濤〉；白居易〈贈薛濤〉均收於《全唐詩》。

³⁸ 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萬裏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於今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收入《全唐詩》。此詩中，王建極力稱揚薛濤的才華，美稱她為女校書及掃眉才子。

³⁹ 參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4月），頁 108。收入楊家駱主編，讀書劄記叢刊第二集第十二冊。

⁴⁰ 《全唐小說》，李匡義《資暇集》，頁 2288。

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⁴¹希望太宗當個好皇帝，為百姓謀福。當國家有難時，更有婦女挺身而出，從軍救民，《舊唐書》載侯四娘三位婦人在史思明之亂時，自願入營為國效力，拯救百姓於水火。⁴²當契丹賊李盡忠寇平州時，鄒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打退賊人；古玄應妻高氏亦固守飛狐縣城，免為突厥所陷。⁴³

因婦女普遍接受文化薰陶，所以在家庭中，母親常是子女的啓蒙老師。《舊唐書·薛播傳》載：薛播伯父元曖妻林氏，為丹陽太守洋之妹。自幼博涉《五經》，善作文章，所為篇章，在當時廣為流傳。「元曖卒後，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摠並早孤幼，悉為林氏所訓導，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開元、天寶二十年間，彥輔、據等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⁴⁴一位婦人照顧七個孩子成人已令人感佩，更何況把他們都培育成材！八歲喪父的元稹，「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⁴⁵她們不僅教導子女學書，更注重教化、注重子女修身立德。如崔玄暉母誠子忠清自勵，誠之曰：

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⁴¹ 《舊唐書》，〈列傳第一·后妃上·賢妃徐氏〉，頁 2167。

⁴² 《舊唐書》，〈本紀第十·肅宗李亨〉，頁 253。「甲寅，上皇幸華清宮，上送於灞上。許叔冀奏：『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

⁴³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三·列女〉，頁 5145-5146。

⁴⁴ 《舊唐書》，〈列傳第九十六·薛播〉，頁 3955-3956。

⁴⁵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六·元稹〉，頁 4327。

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⁴⁶

玄暉母教子爲官以忠於事自許，認爲「貲貨充足，衣馬輕肥」的奉養，若是「非理所得」，那行爲就與盜賊無異且應心中有愧，期許玄暉做到修身潔己，勿使母憂。玄暉能遵奉母氏教誡，在當世以清謹見稱；而劉玄佐母教子忠節事人，《舊唐書》載：「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紵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⁴⁷玄佐母以「不忘本」的身教教子，使他善盡臣節，並能體諒下屬；而李景讓母教子不貪財利，不貴而驕。

母鄭，治家嚴，身訓勤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眾譴，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⁴⁸

景讓母以身教訓誨子弟，在錢財上灌輸「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的觀念，要求子弟敬慎己身，當景讓因升官而貴時，損抑其驕氣，更在動亂將發之際，以智慧消弭軍中的叛變。諸此事例足以說明婦女在子弟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幼年的啓蒙者，更是子弟終身的人生導師。唐代小說亦反映出此種文化氛圍，例如：李畬母教子廉潔、王琚母教子知恥、王義方母教子勇於任事及鄭善果母教子盡忠職守的故事均載於小

⁴⁶ 《舊唐書》，〈列傳第四十一·崔玄暉〉，頁 2934。

⁴⁷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三十九·劉玄佐〉，頁 6000。

⁴⁸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李景讓〉，頁 5290。

說中。

《朝野僉載》載李畬母不貪小惠，揭發監察御史の陋規，讓李畬明白情況，避免犯無心的錯誤，也導正了這陋習。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問車腳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車腳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腳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⁴⁹

除俸祿外，倉官多給的米和錢應該就算賄賂，身為監察御史，更應以最高的道德標準自我要求，否則怎能糾舉其他的大臣！若非李畬母清謹自守，揭發御史所享有的特權，恐怕這情形會一直持續下去，李畬母的作為影響其子，間接達成清吏治的作用。

同書亦載：王琚運用諂媚阿諛自薦，不到一年官職便升為中書侍郎。他的母親知道後，便風塵僕僕從洛陽趕赴京城告誡他：

汝徒以諂媚險詖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則目，海內切齒。吾嘗恐汝家墳隴無人守之！⁵⁰

王琚母以「恐汝家墳隴無人守之」的嚴重後果告誡王琚，以「諂媚險詖」的方式在短暫的時間升至高官，必是做些違法亂紀的事，定會被「海內切齒」，自招災禍。王琚又愧又懼，便聽從母訓辭官。

而《大唐新語》載：王義方母在義方徬徨於忠孝兩難時，鼓勵其子食君之祿，擔君之憂，遇事要移孝作忠，就算自己因此受累犧牲生命，亦不會有所怨恨，反而會感到榮耀。

（王義方）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

⁴⁹ 《全唐小說》，張鷟《朝野僉載》，頁 1476。

⁵⁰ 《全唐小說》，張鷟《朝野僉載》，頁 1538。

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⁵¹

王義方受到母親激勵，上奏章彈劾李義府。⁵²同書亦載有鄭善果母崔氏教子的故事。崔氏期勉鄭善果對公事戮力以赴，無虧職守。

崔氏甚賢明，曉正道。嘗於閣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致方伯，豈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勵己清廉，所蒞咸有政績。⁵³

崔氏以柔性的身教方式教導善果為官之道，期勉他清忠自勵，處事公正。鄭善果對母親的訓誨，能切實聽從，遂成為一代良吏。《舊唐書》亦詳記有鄭善果的事跡。⁵⁴

唐代的文化風尚造就這麼多才女，她們的表現可圈可點，但當時的科考制度卻仍有性別限制拒婦女門外，在當時曾有人大表不滿，如魚玄機。

《三水小牘》載魚玄機「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詠」，所作「風月賞玩之佳句」，士子多爭相傳誦。⁵⁵從魚玄機「致意」於作詩，可知她想藉著詩作有所建樹。她的「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明月照幽隙，清風

⁵¹ 《全唐小說》，劉肅《大唐新語》卷二，頁 1702。

⁵² 《舊唐書》，〈列傳第三十二·李義府〉，頁 2767，對於此事有詳細的記載：「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為別宅婦，特為雪其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為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為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

⁵³ 《全唐小說》，劉肅《大唐新語》卷二，頁 1715。

⁵⁴ 《舊唐書》，〈列傳第十二·鄭善果〉，頁 2378：「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閣內聽之。聞其剖析合理，歸則大悅；若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己為清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由善果母崔氏「曉於政道」看來，可知唐代對女子教育的內容關涉多方面，連「政道」也包含在內。

⁵⁵ 《全唐小說》，皇甫枚《三水小牘》，頁 2975-2976。

開短襟。綺陌春望遠，瑤徽春興多。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句〉）、「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寄李億員外〉）數聯詩句被當時士人公認寫得最好，爭相傳誦。魚玄機刊刻過詩集，和溫庭筠互有往來，每每贈詩唱和。因文才而深受當時士人敬重，⁵⁶所以當魚玄機因笞殺綠翹一事被捕下獄，多少朝士為其美言，為其嘆息。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載魚玄機嘗登崇真觀南樓，賭新科進士題名，有所感賦詩：「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的事跡，推崇魚玄機有與男子相埒的雄心。⁵⁷因閨閣所限不能參與科考，不僅為魚玄機憾恨，連當時的士人亦有同種心態。如《南楚新聞》載關圖有一妹甚聰慧，不論文學或書札，都極優秀。所以關圖常對同僚說：「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對於妹妹的優秀，卻因性別限制，不得與科舉，令他遺憾。⁵⁸

⁵⁶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1998年），頁145。

⁵⁷ 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2刷），頁452。

⁵⁸ 《全唐小說》，尉遲樞《南楚新聞》，頁3130-3131。

第二節 唐人講故事的風氣

一、唐代小說創作的動機

在唐代小說的許多篇章中，作者常在文末敘明故事由來與寫作動機，此有助於對其創作活動及背景的了解。

〈離魂記〉文末云：

玄祐少嘗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歷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⁵⁹

〈任氏傳〉文末云：

大歷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峯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游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宴夜話，各徵其異說。眾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嘆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沈既濟撰。⁶⁰

〈廬江馮媪傳〉文末云：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價，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為之傳。⁶¹

〈李娃傳〉文末云：

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

⁵⁹ 《全唐小說》，陳玄祐〈離魂記〉，頁39。

⁶⁰ 《全唐小說》，沈既濟〈任氏傳〉，頁48。

⁶¹ 《全唐小說》，李公佐〈廬江馮媪傳〉，頁85。

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⁶²

〈鶯鶯傳〉文末云：

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⁶³

〈長恨歌傳〉文末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鴻與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⁶⁴

〈湘中怨辭〉文末云：

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志，為偶倡也。⁶⁵

〈馮燕傳〉文末云：

贊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誼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謂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余以馮燕事，得傳焉。」⁶⁶

《玄怪錄·齊饒州》文末云：

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大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塵，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後已往拜之，精神容飾，殊勝舊日。」⁶⁷

⁶² 《全唐小說》，白行簡〈李娃傳〉，頁96。

⁶³ 《全唐小說》，元稹〈鶯鶯傳〉，頁117。

⁶⁴ 《全唐小說》，陳鴻〈長恨歌傳〉，頁106。

⁶⁵ 《全唐小說》，沈亞之〈湘中怨辭〉，頁123。

⁶⁶ 《全唐小說》，沈亞之〈馮燕傳〉，頁130。

⁶⁷ 《全唐小說》，牛僧孺《玄怪錄·齊饒州》，頁389。

《續玄怪錄·尼妙寂》文末云：

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太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游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⁶⁸

〈飛煙傳〉文末云：

遠後調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隴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復代垣，而與遠少相狎，故洛中祕事，亦知之。而垣復為手記，故得以傳焉。

69

由以上各個作者在其作品末尾的說明可得知，作家獲得小說素材的管道有三種：一、聽聞事件的當事者親自口述，如：〈任氏傳〉、〈鶯鶯傳〉等。二、從和當事者輾轉相識、有親友關係的人身上得知，如：〈離魂記〉、〈馮燕傳〉、〈齊饒州〉、〈飛煙傳〉等。三、從和當事者無關的他人處聞知，部分甚至還見到書面相關作品，如：〈廬江馮媪傳〉、〈李娃傳〉、〈尼妙寂〉等。而作家們的創作動機則為：有的是因為故事傳述多異同，想寫出資料最確實的定本，如：〈離魂記〉等；有的則是認為故事本身具有傳述的價值如：〈廬江馮媪傳〉、〈湘中怨辭〉、〈馮燕傳〉、〈尼妙寂〉等；也有一些作者，是在向友人敘述聽聞時，受友人的鼓勵而將故事寫下，如：〈任氏傳〉、〈李娃傳〉、〈長恨歌傳〉、〈鶯鶯傳〉等。

經由作家在文本末尾的記述，讓我們知道許多小說篇章成文的過程，寫作的人似並未虛構故事，只是將聽聞記錄下來，而這些聽聞，又多已經過一重或多重的轉述。聚會中的眾人對創作常扮演積極的角色，他們對故事直接加以評論，鼓勵作者將故事寫下，或在另一次聚會樂意說給別人聽，做一個第二重的創作者，或是提供書面敘述給他人看，引發下一個創作行動。這種現象，表示唐代小說的創作者與欣賞者關係密切，共同參與

⁶⁸ 《全唐小說》，李復言《續玄怪錄·尼妙寂》，頁 806。

⁶⁹ 《全唐小說》，皇甫枚《三水小牘·飛煙傳》，頁 198。

創作活動。⁷⁰唐代小說成爲提供寄興託意供人欣賞的作品。

小說創作活動從作家自述講故事的場合，可知有的在遊宴上，有的在航船上，有的在朋友的聚會中，而參與者的身分不是官員即是文人，他們所說的全都是閒暇中的徵異話奇，其原因是娛樂，可見當時文人的交游圈中，談奇話異的風氣很盛。正因爲談奇話異的風氣盛行，所以小說作者便自覺地從事創作，欲以故事滿足與會者和讀者好奇心的企圖必然是明顯的，這種不抱功利的目的，只是出於興趣和愛好，徵異話奇的消遣娛樂的需要，成爲小說寫作的根本動力。

韋絢在《劉賓客嘉話錄》序提及：

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語，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⁷¹

韋絢說他做夔州刺史劉禹錫幕僚時經常參加劉禹錫同賓客們的談話，由談到記，反映出《劉賓客嘉話錄》產生的過程，具有普遍的意義。另外，高彥休《闕史·序》云：「資談笑者」，⁷²李肇《唐國史補·序》：「助談笑則書之」，⁷³鄭還古《博異志·序》：「資笑語」，⁷⁴范攄《雲溪友議》序：「讜論交會友，庶希於一述乎？」⁷⁵值得注意的是「資談笑」的功用被提出，可見唐人已逐漸體認到小說具備娛樂的功能。如〈李娃傳〉、〈任氏傳〉、〈離魂記〉、〈盧江馮媪傳〉、〈飛煙傳〉、〈長恨歌傳〉等等，也都經歷了由「畫

⁷⁰ 參見王小琳：〈論唐代小說創作活動的特徵及其對小說敘事的影響〉，《中山人文學報》第9期（1999年8月），頁83-85。

⁷¹ 《全唐小說》，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序》，頁2008。

⁷² 《全唐小說》，高彥休《闕史》，頁2194。

⁷³ 《全唐小說》，李肇《唐國史補》，頁1822。

⁷⁴ 《全唐小說》，鄭還古《博異志》，頁578。

⁷⁵ 《全唐小說》，范攄《雲溪友議》，頁2017。

讌夜話，各徵其異說」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的過程」。

在寫作的過程中，為求有效地敘述故事，以達吸引人的效果，唐代小說作家確實注意到「虛構」、「刻意」的重要性。表現在小說中的，便是題材設計、人物描寫、素材選取、場景烘托等表現大為突出。這種想要說好一個故事的心態及運用的方法，與小說創作的要求不謀而合。短篇小說發展至此，乃由六朝「粗陳梗概」的只具骨架、只見功能性情節的質樸筆記，轉變成「小小情事，悽惋欲絕」的血肉豐盈、充滿描寫性情節的小說美文。

76

唐代小說是在唐代崇文尚藝的社會背景下，由文人才子積極參與而發展成熟的。唐人小說主要的創作方式是，作者在娛樂的集會中，對「徵奇話異」的現實人物和事件傳說，進行藝術虛構和描寫，唐代小說全盛時期的大多數著名作品均屬此類，它們典型地反映了唐代小說自覺「編」、「寫」故事的特點。在唐代民間說話的影響下，士子或官員常相聚而「話」（說故事）或者參與以「話」為中心的宴游聚會，遂成為小說創作重要的題材來源。不少作家都提到這種活動與其作品的關係，如「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沈既濟〈任氏傳〉），「宵話徵異，各盡見聞……公佐因為之傳」（李公佐〈廬江馮媪傳〉），「泊舟古岸，淹留佛寺，徵異話奇」（李公佐〈古嶽瀆經〉），「話及此事，相與感歎……使鴻傳焉」（陳鴻〈長恨歌傳〉），「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話助」（李景亮〈李章武傳〉），「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白行簡〈李娃傳〉）等等。這說明唐代小說特別是其中現實題材的創作，包含兩個過程，一是帶有某種集體性的口頭創作活動（話），二是作家個人的書面創作活動（傳）。作家既是口頭創作的參與者，又是書面創作的完成者。

正因「資笑語」的目的，所以唐代文人為求得故事的新奇，對故事題材便不拘泥陳套且內容多樣化。小說作者自覺地搜奇獵異，製造出小說的

⁷⁶ 參見陳葆文：〈論中國古典短篇愛情小說的演變〉，《淡江中文學報》第5期（1999年6月），頁216。

新奇效果。例如在選材方面，不拘泥陳套，除了鬼怪、人事的紀錄轉敘外，也能配合時代風尚將前人較少涉及的妓女、俠客、舉子的生活納入筆下。在構思方面，為吸引聽者更加重視小說的故事性，情節起伏跌宕、一波三折，使平淡無奇的故事曲折變化出奇情奇趣。文筆描寫也富戲劇性和小說色彩，能很快地引領讀者進入小說設置、渲染的情境中，引發讀者的審美共鳴和快感，取得強烈的審美效應。尤其是唐人作意好奇，合理虛構，採用奇幻之筆寫風塵奇女、社會奇俠、人生奇遇、男女奇情，為小說敷染了奇異的魅力。

由於唐代小說作家作意好奇，有自覺地創作小說，立意虛構，透過小說創造一個豐富多彩的幻想世界，這種創作的傾向，具體呈現為三個方面：一，作者不拘於「古書」的虛構，而向唐代的生活尋找靈感，所以唐代小說多以當代故事為主體。二，作者虛構故事，目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用來寓勸懲，主要為符合「娛樂」此一主要價值。三，勇於幻設，不在乎是否合乎日常的情理，能達到「奇」的要求，一新聽者、讀者的耳目。⁷⁷

二、科舉制度 —— 干謁、游宦

唐代文人講故事的風氣盛行，主要是受科舉制度的影響。因為士子參加科考前，都要進行干謁，彼此之間又需集會切磋學業，自然聚會的機會就增多了。等到通過科考，正式任職後，官員內遷外調頻繁，士人流動性極大，接觸面廣，加以國土廣袤，因而他們經多識廣，尤其有利於故事的交流和蒐集。

唐朝對官吏的考核和任命權，全集中到中央。這種所有官吏集中到京城等待調選的情況是過去所沒有的。如兩漢時，地方上的州府長官由中央任命，但下級掾屬可以由長官自行選拔。《後漢書·百官志》說公府掾吏，皆自辟除。⁷⁸漢宣帝時，張敞任膠東相，就曾「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

⁷⁷ 吳季羣：〈唐人小說之創作方法及特色〉，《古今藝文》第 27 卷第 2 期（2001 年 2 月），頁 39-46。

⁷⁸ 《後漢書》，〈志第二十四·百官一·太尉〉，頁 3558-3559。

人」。⁷⁹至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豪門大族的勢力大加發展，他們更控制了地方上的用人權，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權限受到很大的限制。

但唐朝的情況卻有很大的變化，貞觀十年，馬周以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時，「始奏選入取所由文（一作文由）解，十月一日起首，三月十日畢」（《封氏聞見記》卷三〈銓曹〉），⁸⁰從這以後，就成為唐代銓選官吏的時間上的定格。總之，唐朝將官吏的任免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中央，打破南北朝時豪門大族對政治的干涉和操縱，以適應統一的國家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們在唐人的詩集中可以經常看到送縣令、縣丞、縣尉和外地州縣參軍奉調赴京的篇什，而在唐人的一些小說中更可以看到有關這方面的具體描寫。各地基層官員入京調選是相當頻繁的，不瞭解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讀唐人詩文集時，就會有一定的困難。

李復言《續玄怪錄》卷一〈辛公平上仙〉，記「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他們兩人冒著雨住入「洛西榆林店」，後來經過一些不平常的遭遇，第二年，辛公平被授為揚州江都縣簿，成士廉則授為兗州瑕丘縣丞。這是江西的兩個縣尉入京調選，結果是一赴揚州一赴兗州。⁸¹《集異記·王四郎》寫洛陽縣尉王琚憲宗元和時，赴長安調選。⁸²《集異記·賈人妻》寫江西餘幹縣尉王立，調選入京，就居於大寧里，文書有誤，為有司駁放。⁸³又如張讀《宣室志》卷六記：「大歷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繼而僑居永崇里。」⁸⁴浙江偏遠地區的一個縣尉，為了調選，也須千里迢迢跑到長安去。這種情況不獨大歷中為然，初唐就已經如此，如駱賓王〈送王贊府上京參選賦得鶴〉詩，中有云：「振衣游紫府，飛蓋背青田。」牛僧孺《玄怪錄》卷三〈齊饒州〉湖州參軍韋會於長慶三年入京調選。這些情況

⁷⁹ 《漢書》，〈列傳第四十六·張敞傳〉，頁 3220。

⁸⁰ 《全唐小說》，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三〈銓曹〉，頁 1621。

⁸¹ 《全唐小說》，李復言《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頁 761-763。

⁸² 《全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王四郎》，頁 633-634。

⁸³ 《全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賈人妻》，頁 644-645。

⁸⁴ 《全唐小說》，張讀《宣室志卷六第 80 則》，頁 1301。

可以提供我們對唐代社會一個側面的認識。當時以長安為中心，在通往四方各地的大道上，有多少來往奔波的行人、商賈不必說，應考的士子一年有幾千人，還有如上面所說的，為數眾多的應吏部銓試的地方上各級基層官員。至於州刺史以上大員的調動及隨從人員，就更不用說了。這就是我們可以想見到的唐代驛道上的繁榮匆忙的景象。

無論是遊學或遊宦，總得要離開熟悉的家園走向陌生的外面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時時處處潛藏著危險。所以漫遊的第一需要是安全。在漫遊風氣形成的初唐和盛唐，社會秩序穩定，治安情況良好，遠行人無需為人身安全擔心。《通典》卷七說那時「遠適數千里，不遲寸刀。」⁸⁵這恐怕是漫遊風氣形成並風行日久的基礎條件之一。

唐代交通發達，這和商業貿易興盛、城市增多有直接關聯。《通典》卷七載：「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驢驛。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屬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⁸⁶交通網絡四通八達，且代步工具取得便利，店肆亦處處林立，這是漫遊風氣形成的條件之二。

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是唐代漫遊風氣形成的第三個原因。《通典》卷七說天寶八年全國各地糧倉儲糧達九千六百零六萬餘石，其中含嘉倉一處儲糧達五百八十三萬石。所以《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六說「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通典》卷四十載：「吏員雖眾，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⁸⁷盛唐的富足，還是當時人杜甫說得最生動，其〈憶昔二首〉其二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經濟繁榮對漫遊風氣形成的直接影響就是即使是用錢去買飯，因為物質豐富，物價低廉，也用不了

⁸⁵ 《通典》卷七〈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頁41。

⁸⁶ 《通典》卷七〈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頁41。

⁸⁷ 《通典》卷四十〈職官二十二〉，頁231。

多少錢。特殊的身分使文人樂於漫遊，安全的世界使文人敢於漫遊，富庶的社會使文人能夠漫遊。有此種種，唐代文人的漫遊習氣就盛行起來了。

既然漫遊習氣盛行，「餞別」就成為唐代文人生活的一部份。在唐代詩歌中，「送別詩」佔有一定的數量，其內容就是送人漫遊。如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岐路，兒女共霑巾。

這首在送別詩史上赫赫有名的詩篇題目就表明是送人宦遊。這是朝廷正常公派的宦遊，大量的科舉中第者在吏部領到任命文書後都會有這樣的宦遊。

如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楊柳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這詩則是送人遊邊塞，與友相別的深情令人動容。在唐人詩中，這類送人遊邊的作品數不勝數。例如：

高適〈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韓翃〈送長史李少府入蜀〉：

行行獨出故關遲，南望千山無盡期。見舞巴童應暫笑，聞歌蜀道又堪悲。孤城晚閉清江上，匹馬寒嘶白露時。別後此心君自見，山中何事不相思。

施肩吾〈旅次文水縣喜遇李少府〉：

為君三日廢行程，一縣官人是酒朋。共憶襄陽同醉處，尚書坐上納銀觥。

王昌齡〈送歐陽會稽之任〉：

懷祿貴心賞，東流山水長。官移會稽郡，地邇上虞鄉。緩帶屏紛雜，漁舟臨訟堂。逶迤迴谿趣，猿嘯飛鳥行。萬室霽朝雨，千峰迎夕陽。輝輝遠洲映，曖曖澄湖光。白髮有高士，青春期上皇。應須枉車歇，為我訪荷裳。

王維〈送楊少府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裏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

姚合〈送河中楊少府宴崔駙馬宅〉：

鳳凰樓下醉醺醺，晚出東門蟬漸聞。不使鄉人治驛路，卻將家累宿山雲。閒時採藥隨僧去，每月請錢共客分。縣吏若非三載滿，自知無計更尋君。

這些詩作皆是送人遊宦的作品，詩人們藉著詩作表達對友人遠行依依不捨、眷戀不已之深情，唐代文人間友誼之深摯，實屬歷代所罕見。

三、唐人對科舉的看法

科舉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六朝以來「平流進取，坐至公卿」⁸⁸的門閥士族一統天下的局面，整個社會上「尚冠冕」，以重視官階爵祿的新風尚，

⁸⁸「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引自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ukey=10944540&rid=-2>

使渴望建功立業，獲取官階爵祿，實現政治抱負，成為唐代文人視為最高榮譽之所在。唐代許多著名將相都是科舉出身。這就在唐代文人面前展現一條實現政治理想的新的途徑，激發了他們強烈的科舉仕途欲望。

唐代隨著科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長足發展，讀書人被抬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政府官員乃至宰相，無不由讀書人擔任，其中更主要的是由科舉及第者擔任。既然讀書人面前擺著一條可以飛黃騰達的大道，普通人家的家長自然無不望子成龍，落實到行動上，便是課子讀書，勤加督責，勸其懸梁刺股，不敢稍有懈怠。時至開元、天寶年間，由於社會上形成了「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五尺之童恥不言文墨」的風氣，「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成為唐代教育的一道習見風景。這些話見載於《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⁸⁹說這話的是中唐史學家杜佑，因而具有不可置疑的歷史真實性。

中唐文學家韓愈有一首題為〈符讀書城南〉的詩，其中說：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疏。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韓愈把一個人腹中有無詩書提到人能否為人的高度，一語道盡了中國人重

⁸⁹ 《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歷代制下〉，頁 83。

視讀書的心態。在這段話裏，韓愈對本詩的特定讀者「符」諄諄教誨。先是給符以鼓勵：沒有人是生而知書的天才，一個「勤」字是獵取書本知識的必由路徑。接著啓發：人在孩提時代，本無聰明與愚昧之分，到弱冠時期，就開始有了高下；到而立之年，少年玩伴有的成爲眾人仰慕、家人自豪的公卿，有的淪爲被人呼使、自身受罪的馬前足，這都是因個人少年時的苦學與不學之別，和出身並無關係。再來舉例：公卿常出身微賤，而三公之後人常淪落到飢寒交迫的境地。

從韓愈的詩中不難明白，他的讀書觀並不以純粹的提高個人素養爲旨歸，而是以進入仕途享受富貴爲終極目的。這樣的讀書觀當然透著俗氣，但卻十分實在。詩題裏的「符」指韓符，韓愈的兒子，「城南」是詩人在長安城南的別墅。換句話說，作爲一首在家中寫給兒子的詩，其讀者對象和創作環境都自然不過地暗示著他所說的是真心話，因而也就具有了我們瞭解唐代文人所不可缺少的心理學價值。

唐人普遍重視讀書，這從他們的自我陳述中即可看出。如徐彥伯〈擬古〉一詩其中提到：「讀書三十載，馳騁周六經。儒衣千時主，忠策獻闕廷。一朝奉休盼，從容廁群英。束身趨建禮，秉筆坐承明。」崔日知〈冬日述懷奉呈韋祭酒張左丞蘭臺名賢〉亦提及：「弱齡好經籍，披卷即怡然。覃精四十載，馳騁數千言。」孟浩然〈書懷貽京邑同好〉：

維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霑末躬。晝夜常自強，
詞翰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
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
安能守固窮。當途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離異，翻飛何日同。

雖然他們說的是自身的經歷，但著實反映了唐代士人好學苦學的一般情況。唐代士子讀書也以功名爲目的，這與前代士子並無二致。在功名未就之前自然要讀書，即使有了功名後，書仍然是要讀的，只是目的略有不同罷了。如李白詩名滿天下後待詔翰林時就還在讀書，有詩云：「晨趨紫禁

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尤其是「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兩句，真是讀書人心中皆有的妙語，把古往今來讀書人在書中找到前代知音時的快意和得意準確地表述出來。詩的題目就叫〈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想來，李白所「言」之「懷」當是集賢殿諸學士共同的讀書感受吧！

唐代進士科的影響也擴及於各階層的家庭生活。人們對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看法，人們的價值觀以及倫理觀觀念，都有了新變化。《玉泉子》記載，趙琮為鍾陵大將的女婿，因久舉不第，「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趙琮夫婦被摒絕於帷幕之外。設方酣，忽然廉使馳吏呼將，大聲報喜：「趙郎及第矣！」大將家族趕緊撤去帷幕，邀趙琮夫婦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⁹⁰這說明一個人能否在科試中獲得成功，是衡量這個人價值的主要標準。唐代宗時的宰相元載，年輕時的遭遇更為典型。《雲溪友議》載王相公鎮守北京，以女兒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親屬以元載夫婦為乞兒，「厭薄之甚」。後來，元載游秦，屢陳時務，獲得肅宗器重擢拜中書，洎代宗朝亦任相職，「交游貴族，客候其門」，內外親族悉來道賀，和當日被稱乞兒受人蔑視的情狀，形成雲泥之別。⁹¹由此可見，科舉這道「龍門」不僅影響了社會階層的移轉，還左右了人們的價值觀及天賦的人倫親情。

⁹⁰ 《全唐小說》，玉泉子《玉泉子·趙琮》，頁 2239-2240。

⁹¹ 《全唐小說》，范攄《雲溪友議》，頁 2073。

第三節 藩鎮的割據

一、藩鎮的成因

歷史上因為中央政局的動盪不穩，導致地方勢力趁機坐大，進而引發全國性動亂的現象，可說是屢見不鮮。其中涵蓋時間最長，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唐代中葉以後的藩鎮。⁹²

唐初原因襲隋朝的府兵制，⁹³府兵制的優點為「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百姓平常可從事自己的本業，朝廷也不需花額外的經費養兵，並且將帥沒有機會專權。但府兵制敗壞後，方鎮（藩鎮）大盛，「武兵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⁹⁴等到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起兵謀反，天子之兵弱不能抗，於是攻陷兩京。

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使唐帝國元氣大傷，民生凋弊，曾為詩人們豔羨的盛世氣象一去不返，接踵而來的是強藩林立，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分別佔據盧龍、魏博和成德等地，不受朝命，不輸貢賦，自署將吏，「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⁹⁵構成了對大唐帝國的嚴重危脅。而面對這種局面，中央王權力不能制，只好「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⁹⁶代宗、德宗朝的這種退讓政策，雖在圖一時之苟安，結果卻是姑息養奸，終就釀成大亂。德宗建中三年，涇原藩兵發難，德宗倉惶出逃奉天，從而爆發了一場持續五年之久的大規模兵

⁹² 參見張榮芳：〈惡相師·機相伺·逆相報——唐德宗時期的藩鎮與政局〉，《歷史月刊》第37期（1991年2月），頁104。

⁹³ 《新唐書》，〈志第四十·兵〉，頁1324。

⁹⁴ 《新唐書》，〈志第四十·兵〉，頁1328。

⁹⁵ 《新唐書》，〈表第四·方鎮一〉，頁1759。

⁹⁶ 《新唐書》，〈志第四十·兵〉，頁1329-1330。

亂，史稱「建中之亂」。戰亂中，各路叛軍紛紛自立名號，僅稱帝稱王者，先後就有朱滔、王武俊、田悅、朱泚、李希烈等人。這場戰亂經過艱難的努力，最後雖然被平定了，但德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此後再也不敢輕易向藩鎮用兵。

二、人民的心理需求

唐朝前期為太平治世，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朝野僉載》載：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⁹⁷

這則記載描寫了睿宗時元宵節百姓歡樂、熱鬧的景象，若非國家富庶，治安良好，斷不能有這樣的生活。安史之亂後，藩鎮各據一方，彼此傾軋、爭亂不息，在這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中，百姓痛苦地生活著。而唐朝廷無力解決藩鎮的亂象，還帶給人民更大的痛苦：在德宗建安三年，田悅密與朱滔、王武俊等謀叛，當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無法負荷，竟用太常博士陳京等人之議，向長安商人借錢。雖名為借錢，實際行為卻像強盜一般，使得京師囂然，人不勝苦。⁹⁸在朝廷無法依恃下，百姓在各藩鎮角力的動亂生活中，只能希望擁有異能的人，為他們主持公道，俠女、俠客這類人物就在這特殊的心理期待下，被文人創作出來。

文人常藉筆端來抒發自己的觀感，當時代動盪不安，百姓亦遭受著戰亂壓迫之苦時，他們便忍不住訴諸筆端。中晚唐社會，藩鎮割據，許多軍閥常為爭權奪利或報仇雪恨而私蓄刺客，互相陰謀刺殺，而人民亦受到嚴

⁹⁷ 《全唐小說》，張鷟《朝野僉載》，頁 1483。

⁹⁸ 參見傅璇琮等著：《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唐卷》，（瀋陽：遼寧出版社，1998年），頁 375。

重的欺壓。文人以此作為題材，所以大量的俠客便紛紛登場於唐豪俠小說中。也因藩鎮的專橫殘暴，民眾終日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他們莫不引頸以盼豪俠之士能除暴安良，拯救社會大眾，抗禦所有不平之事。

人們認為俠客具有俠義心腸，快意恩仇，能平不平之事，更能為無關之他人勇赴危難。「報」一向被視為俠的道德原則，只是此處的「恩仇」是無關乎國家社會。唐豪俠小說中的俠客是重私人之間的然諾恩仇，不管是主人、知己之恩，抑或是親人之仇，他們都直接以行動來完成「還報」的任務。而在還報的過程中，也許會遇到某些困難，但此皆無法動搖俠客的意圖及意願。就算成功率極低，他們依然毫不猶疑地行使技擊及神術來達成選定的任務。唐人筆下的豪俠個個身懷絕技，遇事沈謀能忍，務求一擊即中，行事毫不拖泥帶水。如小說中冰雪聰明的紅線願解主憂，其方式便是深入敵區以盜取金盒，來顯示主人的威名並消弭即將發生的戰爭。深入禁區顯然不是一般人的能力所能為。而聶隱娘為了報劉昌裔的知遇之情，乃奮不顧身地施展神技與刺客決一死戰。另外三鬟女子早抱有為恩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決心，因此尋回失竊的玉念珠只是小事一樁罷了，而所謂的恩德僅為對方刻意所施噓寒問暖類的小恩小惠。車中女子亦為了救僅有一面之緣的無辜他人而勇闖地牢，不惜觸法。他們重情意，重誠義，施恩者一分予他們，他們便以十分來還報，「受恩還報」即是他們行事的準則。至於為復仇而行俠者，則有謝小娥、崔慎思妾、賈人妻等人，她們憑著一介女子，隱忍負重，伺機而行，似乎只為復仇而活，其餘的所作所為只是動機底下的掩護。她們對於復仇之事是勢在必得，只要能達成目的，再大的犧牲也是值得。⁹⁹

對於上述這些唐俠客來說，她們行使任務時，從不會有失誤的情況發生，亦不可能有未完成的任務，這或許是作者在確定俠客存在價值的苦心用意，畢竟讀者所盼望的俠客是能解救大眾於困厄之中的，是所向無敵對危險無所畏懼的。

⁹⁹ 參見蔡明真：〈談唐豪俠小說中的恩與仇〉，《輔大中研所學刊》第6期（1996年6月），頁333-334。

三、女俠的出現

豪俠在晚唐成爲小說的主要人物。中唐，豪俠只是小說情節中的配角，如：蔣防〈霍小玉傳〉中的黃衫客，許堯佐〈柳氏傳〉中的許俊。他們均激於義氣，一爲帶李益去見霍小玉；一爲從番將處搶回柳氏，交還韓翊。事後均不求回報，尤其黃衫客不留姓氏，飄然離去，這是中唐的豪俠。但時至晚唐，藩鎮爲禍加劇，時局更加艱困，百姓遇不平之事常求救無門。這時文人筆下出現大量的豪俠小說，在小說中，豪俠們有的替百姓濟危扶困，有的替恩人分憂，有的報一己之恩仇。不論其動機爲何，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時人的心理及其時代性。：唐末藩鎮割據，武人專橫，多蓄養死士刺客互相殺戮，安史之亂後社會動盪不安，百姓成了犧牲品。在傳統的俠義觀念流傳下，俠義活動自然興盛。¹⁰⁰

這時期的小說有個特殊現象，即出現眾多女俠，此現象爲前代小說所未有。這些人物爲：

人物	身分	神通及絕技	俠義事跡	出處
賈人妻	賈人之妻	身如飛鳥	得報己仇	薛用弱《集異記》
謝小娥	估女	無	得報己仇	李紳〈謝小娥傳〉
尼妙寂	估女	無	得報己仇	李復言《續玄怪錄》
崔慎思 妾	不詳	身如飛鳥	得報己仇	皇甫氏《原化記》
車中女 子	不詳	身如飛鳥	救出無辜舉人	皇甫氏《原化記》
三鬟女	庶人	身如飛鳥	爲王超取回失	康駢《劇談錄》

¹⁰⁰ 參見李嘉琪：〈唐人小說〈謝小娥傳〉析論〉，《語文教育通訊》第22期（2001年6月），頁19。

子			物	
聶隱娘	大將之女	劍術、身輕如風、變化之術	殺不義之人保護劉昌裔	裴鉞《傳奇》
人物	身分	神通及絕技	俠義事跡	出處
女尼	尼	劍術、身輕如風、變化之術	殺不義之人	裴鉞《傳奇》
紅線	奴婢	一更之間往返七百里	取回金盒，消弭潞州兵禍	袁郊《甘澤謠》

這些女俠除了少數身分不詳及將門之女外，餘為庶人或是地位更為低賤的奴婢。她們有的報了自己不共戴天的深仇，有的剷除為害百姓的惡人，有的弭平一觸即發的兵禍危機，保護了百姓的身家安全，這種種情事應是唐朝廷必須為百姓做的，諷刺的是卻是由百姓自己完成，當中立功最大、造福最多人的還是被視為賤民的女婢紅線。對於不能保護人民的朝廷，百姓是無法寄予厚望的，文人透過筆下的小說反映了此一事實。

唐代崇尚自由、武功肇盛，只要有才能、技藝，就算是奴隸身分、婦女依然被尊重，且唐代婦女普遍接受教育、思想自由，再加上當時風氣崇尚胡風，婦女行動自由、騎射、男裝所在多有，因此不難在小說中出現了眾多女俠。